



論錢謙益詩學的世運說

朱莉美

德霖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國文科講師

摘要

錢謙益在七十五歲為杜蒼略題自評詩文時，提出「靈心、世運、學問」的詩文主張，他說：「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啓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錢謙益以燈火之焰來自「炷、油、火」三者的配合，比喻詩歌的創作來自詩人「靈心、世運、學問」三者的結合。

錢謙益認為詩歌的價值在於內涵的意蘊，反對盲目追求格律形式，他重視格調，但更注重寫作時真情流露，表現時代精神，於是提出「靈心、世運、學問」之說，主張詩歌的本質是抒情言志，抒寫作者的思想感情，消釋悲憤、排遣幽懷，褒貶施政、揭露時弊，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以期發揮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

錢謙益的文學思想，主張抒寫性情、重視世風世運、提倡尊經復古，尤以晚年提出的「靈心、世運、學問」，具體呈現以往個人的詩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也建構起錢謙益文學



思想體系的框架。其中的「世運說」，不僅是錢謙益詩論的重要特色，也明確標示出他和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詩論的差異。錢謙益的「世運說」包含「感物而動」、「溫柔敦厚」、「窮而後工」、「詩兼史義」等思想內涵。

筆者擬以《錢牧齋全集》為主，透過錢謙益為其它詩人所寫的序跋題記、與友人的論辨書翰解析其世運思想，其《初學集》、《有學集》存有大量的詩序，有助於抽繹「世運說」的主張，並以《列朝詩集小傳》為輔，檢視他對「世運說」的見解，裨補闕漏。希望藉由本文，讓讀者更深刻體認錢謙益對明代詩壇及後世詩學的貢獻。

關鍵詞：錢謙益 詩學理論 世運 以詩證史 窮而後工



Comments on World Movement in Qian Qian-yi's Poetry

Ju, Lin-meei

Abstract

Qian Qian-yi made some comments on the works of Du Canglue when he was 75 years old and proposed the ideas of “Spirit Heart, World Movement and Learning”. With the “the wick, the oil and the fire” which come from the flame of light, he drew an analogy between the flame of light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et. He suggested that the creation of a poet is composed of “Spirit Heart, World Movement, and Learning”.

Qian Qian-yi thought that the value of the poetry lied 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mplication, opposed to pursue the form or style blindly.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yle, but paid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true feelings when writing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pirits of the age. Therefore his writings strongly expressed the spirit of realism, which was for the age and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Qian Qian-yi's literature thoughts advocated to expresses the personality in writing, to reverse after restored the past, to



emphasize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phenomenon as well. The ideas of “Spirit Heart , World Movement and Learning” proposed in his old times, specifically presenting his individual prose theory and the creation practice and also constructed the frameworks of Qian Qian-yi literature ideology. Among them, the “World Movement” contained the concepts of “the feeling to move”, “the poem concurrently history righteousness”, “the more destitute the writer the better his work”, “gently honest” and so on.

Key words: Qian Qian-yi ; Poetics theory ; World Movement ; By poem card history ; More destitute the writer the better his work.



一、前言

錢謙益（1582—1664）是明末清初的文壇巨擘，《清史稿》說他：「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¹；清末徐世昌（1855—1939）編《晚晴簃詩匯》時說：「錢謙益才大學博，主持東南壇坫，為明、清兩代詩派一大關鍵」²，可見錢謙益在當世文壇舉足輕重的地位。

明代弘治（1488—1505）至萬曆（1573—1620）年間，雄踞壇坫近百年的前後七子主張「詩必盛唐」，寫作詩歌講究格調古法，表現盛唐詩歌的高格朗調，形成復古主義的風潮，七子末流卻產生模擬剽竊之弊。清代賀裳（不詳）說：「盜法一事，詆之則曰偷勢，美之則曰擬古」³，七子派的追隨者，由模擬古人的「復古」主張走向蹈襲影從，即由「擬古」淪為剽竊前人。

萬曆年間，公安派為矯正七子派所造成的流弊，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⁴，主張新變，作品表現個人的情感，寫一代一人之文，強調詩文創作「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⁵，而且無事不寫，無景不入，然而率性而作，偏重詩人

¹（清）趙爾巽（1844—1927）主編：《清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5月），頁1493。

²（清）徐世昌（1855—1939）編選：《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店，1990年10月），頁544。

³（清）賀裳：《載酒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頁219。

⁴（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敘小修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頁188。

⁵同前註。



主觀的感受，忽視社會現實的反映，結果產生空疏俚俗的弊病。

竟陵派一方面繼承公安派的「性靈說」，但要避免公安派鄙俗淺率之弊；另一方面要合於古典詩歌體裁法度的要求，取法復古派重視古學之長，但要避免學古所造成的模擬之弊。於是追求「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⁶的境界，表現含蓄幽深、虛無縹緲的情境，最終走向逃避世俗的虛幻意象，形成艱澀難解的詩境。

七子派於格律求詩，竟陵派於字句求詩，然而單純的模仿形似或創造險僻的詩境，必然會導致情志的不真實。錢謙益要求詩歌表現性情、反映時世，重視詩歌內涵，於是在〈題杜蒼略自評詩文〉中提出「靈心、世運、學問」之說，他說：「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啓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⁷，錢謙益以燈火之焰來自「炷、油、火」三者的配合，比喻詩歌的創作來自詩人「靈心、世運、學問」三者的結合。對於晚明的詩壇亂象，具有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作用。

錢謙益詩學首重內容，其次論形式，對於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詩論，捨短取長，同樣重視性靈、古學、格調，但是積極要求詩歌的時代精神，認為詩文創作萌發於詩人內心的情感，受到身世遭遇、社會治亂、國家盛衰等外在事物、境遇際會的激盪，才會產生創作的慾望，於是詩人憑藉著豐

⁶（明）鍾惺、譚元春選評：《詩歸》，〈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頁3。

⁷（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有學集》，〈題杜蒼略自評詩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頁1594。



富的學養，將所感所見，形之於詩歌，才是有價值的傳世之作，所以錢謙益與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詩論最大的差異，就在於「世運說」的提出。

關於「世運」之說，錢謙益說：「《詩》、《春秋》之大指，明王道、扶世運」⁸，無論是以歌謠形式反映現實生活的《詩經》，抑或以微言大義褒貶人物的《春秋》，皆具有闡明王道、匡扶世運的功能。此「世運」指世間盛衰治亂的氣運，而「匡扶世運」則是儒家的經世思想。

清代顧炎武（1613—1682）講求「經世致用」，《日知錄》說：「文須有益於天下」⁹，認為文章必須有益於治理世事，切合實用；清代王夫之（1619—1692）說：「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¹⁰，強調詩歌必須即景會心，重視文學與現實、時代的關係。錢謙益的「世運說」與儒家的經世思想接近，錢謙益「反經循本」的主張，與其世運思想有密切的關係，有關錢謙益「反經循本」的論述，筆者擬以專篇論述，另文發表。

《文心雕龍》〈時序〉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¹¹、「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¹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¹³，〈時序〉主要說明歷代文學

⁸ 同註7，《有學集》，〈贈王平格序〉，頁913。

⁹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1079。

¹⁰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明倫出版社，1971年12月），頁9。

¹¹ （南朝梁）劉勰撰：《元刊本文心雕龍》，〈明詩〉，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90。

¹² 同前註，頁190、191。

¹³ 同前註，頁196。



的轉變，皆有其時代環境的色彩。這裡的「世情」、「時運」、「與世推移」說明文學是社會的反映，人情世俗、朝廷決策、帝王取向，都會影響當時的文學創作，與錢謙益世運思想的內涵相似。

明代王時敏（1592—1680）指錢謙益「用事奧僻」¹⁴，錢謙益說明自己用典隱僻之因在「苦畏」，而時人「用事奧僻」之因則在「苦貧」。所謂「苦畏」，如《春秋》之「託寄微詞」、「鉤牽讒語」，以隱微之言寓褒貶大義，乃因時制宜，不得已而為之；「苦貧」則是「餽釘奇字」、「駢花取妍」，採摭異聞，勉強拼湊，爭奇鬥妍而適暴其短。所以錢謙益說：「苦畏之病，僕所獨也；苦貧之病，眾所同也。文章之病，與世運相傳染」¹⁵，此「世運」指當世的風俗時尚。

錢謙益云：「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熏結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¹⁶，由於前後七子對明代文壇深遠的影響，導致文人對於學問的定義，繆種流傳，文章的表現「敗壞而不可救」。此「世運」亦指當世的風俗時尚。無論是「世間盛衰治亂的氣運」或「當世的風俗時尚」都不能全面地解釋錢謙益「靈心、世運、學問」中的「世運說」。

¹⁴ 同註7，《有學集》，〈復王煙客書〉，頁1366。

¹⁵ 同前註。

¹⁶ 同註7，《有學集》，〈賴古堂文選序〉，頁768。



當代有關錢謙益「靈心、世運、學問」思想的重要專論有：孫之梅〈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的詩學綱領〉¹⁷，此篇與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中「靈心、世運、學問」的內容¹⁸幾乎相同，對錢謙益靈心、世運、學問的思想主張的闡述，見解精闢，是最早以此為研究專題的期刊論文，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其中「世運」的部分，以作家的境遇對作品的激發作用，論述世運的變化對文學的影響；從詩史同源立論，說明亂世文學應具有史的功能，錢謙益借《列朝詩集》以存史，借《投筆集》以記史。

翁容在〈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詩論小議〉¹⁹中指出，錢謙益的詩學主張是基於「詩言志」的傳統，藉由「返經循本」來糾正時弊、轉變文風，並由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及唐宋派的主張中借鑑、學習，形成靈心、世運、學問的理論體系。在「世運」部分，闡述錢謙益情志與世運的聯繫、詩之義本於史的主張。

張永剛〈靈心、世運、學問——論錢謙益的詩學體系〉²⁰，指出錢謙益「世運」的中心觀點在「運世遷流，風雅代變」，前後七子割時代為鴻溝的謬誤；提倡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補救竟陵派噍殺之音。張永剛認為錢謙益靈心、世運、學問

¹⁷ 孫之梅：〈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的詩學綱領〉（《山東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頁23—29。

¹⁸ 見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第三章（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2月），頁257—279。

¹⁹ 翁容：〈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詩論小議〉（《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40—45。

²⁰ 張永剛：〈靈心、世運、學問——論錢謙益的詩學體系〉（《大連大學學報》，2008年10月），頁47—50。



的詩論體系，核心內容在於「世運」，據此強調尊經師古，摒棄俗學，倡導經世致用之學。

裴世俊在《錢謙益詩歌研究》²¹中，以「濟之以變，注重詩與世運的關係」為標題，強調適變、革新，駁斥七子派、竟陵派之非。裴世俊認為錢謙益在靈心、世運、學問中，「把客觀外界的境遇際會，交感於詩人的情志靈性，放在了首位」²²，「世運」在此擔負起催化的特殊作用，「使詩歌跳動著時代的脈博，迴響著現實的聲音」²³，生動表達詩歌與現實的關係，最後以《列朝詩集》的編纂為例，顯示以詩證史的世運思想。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²⁴中「世運」的部分，以「以悲為主，反映世運，這就是錢謙益對李商隱詩歌的評價」²⁵及「早年的錢謙益開展了以詩繫史的律詩創作，中年的錢謙益繼承了審音度世的傳統，晚年的錢謙益揭示了「悲情世運的主旨」²⁶為論述的主軸。丁功誼以錢謙益對李商隱的學習和錢謙益世運思想在詩歌中的實踐，作為論述的重點，很有見地。

以上論著皆有其獨到的見解和觀點，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壇巨擘，黃宗羲說他：「主文章

²¹ 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13—217。

²² 同前註，頁215。

²³ 同前註，頁216。

²⁴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頁118—122。

²⁵ 同前註，頁205。

²⁶ 同前註，頁209。



之壇坫者五十年」²⁷，「世運說」是錢謙益文學思想架構的重要主張，筆者擬由錢謙益的著作文本，檢視其世運思想的萌發、特點及影響。

從「感物而動」出發，觀察錢謙益所論詩歌創作的根源；從「溫柔敦厚」詩教的繼承，觀察錢謙益所論詩歌創作的本質；從「窮而後工」的觀點，觀察錢謙益所論詩歌創作的的方法；從「詩兼史義」的立場，觀察錢謙益所論詩歌創作的功能。根據以上四個面向，解析錢謙益「世運說」的起源和內涵。

二、「感物而動」：詩歌創作的根源

錢謙益多次藉《詩經》闡述詩歌的產生，源於詩人「感物而動」之情，他在〈尊拙齋詩集序〉中說：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²⁸性不能以無感，感不能以無欲。物與性相摩，感與欲相盪，四輪三劫²⁹，促迫於外，七情³⁰八苦³¹，煎煮於內，身世軋戛，心口交蹠，萌於志，發於氣，衝擊於音聲，而詩興焉。³²

²⁷（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思舊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頁374、375。

²⁸（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頁3。

²⁹佛家語，丁福保編著：《佛學大辭典》（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7月），頁303。

³⁰同前註，頁107。另見於《禮記正義》，〈禮運〉，頁431。

³¹同註29，頁1564。

³²同註7，《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尊拙齋詩集序〉，頁411。



《禮記》〈樂記〉指出「感物而動」是天性之必然；人的情緒受到外在遭遇的感發激盪，內心的情慾苦楚必然受到翻攪。情感受到波動，「七情八苦」的意念開始萌發，個人的才性受到激發，藉由詩歌聲律來表現，於是詩歌便產生了。因此藉由詩歌可以「哀樂而樂哀，窮通而通窮，死生而生死，性情之變窮」³³，盡情的表達人的哀樂、窮通、死生、榮辱等不同的感受。詩人受到外境的擊發，藉詩歌以宣導情志，所以《詩經》中的風謠，俯拾可見初民真誠無偽的情感，這些詩歌表現情性、反映現實，成爲中國古代詩歌的瑰寶。

《詩經》的「感物而動」是詩歌創作的根源，也是錢謙益提出的世運思想的作用。「世運」對詩歌創作的意義，翁容說：「把情志與世運聯繫起來，錢謙益並非一般地談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現實生活的關係，而是特別強調身世之偏塞、政治之污穢、時運之蹇偃對人感情的激發作用」³⁴，翁容將錢謙益的「世運」對詩歌的激發作用，作了很好的詮釋。

錢謙益認爲詩歌因「世運」而發的特徵，是古代文人胸懷宇內，以天下爲己任的具體呈現。寫作詩歌除了抒發憂己傷時的感受之外，更關注於國計民生，因而國家的盛衰治亂、歷史的成敗得失，皆表現於詩歌之中，於是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前提下，關懷社會，反映現實，不平則鳴。錢謙益〈瑞芝山房初集序〉云：

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

³³ 同前註。

³⁴ 翁容：〈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詩論小議〉（《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43。



其境會相感，情偽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³⁵

古人對於天地萬物、古往今來、政治興衰、學問道德，事事關心，迨及情生於境，又與境會相互激蕩，憂思縱放，非有意寫作詩文，而詩文自然產生。

錢謙益說：「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而擊發于境風³⁶識浪³⁷奔昏交湊³⁸之時世」³⁹，寫作詩歌是爲了表達志意之所趨，當文人作者內心充滿感懷，奮發興起意氣，並與外在之境遇相互擊發，因而有詩產生，即「境會相感，情偽相逼」的作用。錢謙益〈題燕市酒人篇〉云：

詩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噍殺，紆緩促數，窮于時，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詩也。⁴⁰

當情感充滿於胸臆，激發出強烈的創作動機時，細微如土中養分的脈動，發動如依節候出沒昆蟲的噪鳴，歡暢、衰颯、舒緩，促數更易；詩人「窮於時、迫於境」的遭遇，一旦受到境遇的觸動、擊發，衍生出奔逸流動的寫作靈感，就能寫出好詩。「萌於志、生於情、動於氣」，也就是錢謙益所說的「蟄啓于世運」，他在〈虞山詩約序〉中說：

³⁵ 同註7，《初學集》，〈瑞芝山房初集序〉，頁959。

³⁶ 佛家語，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9年2月），頁1406。

³⁷ 同註29，頁2861。

³⁸ 同前註，頁1224。

³⁹ 同註7，《有學集》，〈愛琴館評選詩慰序〉，頁713。

⁴⁰ 同註7，《有學集》，〈題燕市酒人篇〉，頁1551。



古之爲詩者，必有深情畜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困結轡，膝朧萌折，知所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樸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⁴¹

「深情」是作者與外物相互激發之感受；「奇遇」是指作者所處的環境、時代背景，以至於對政治興衰的感慨。如「驚瀾奔湍」受到壓抑，「長鯨蒼虬」受到困禁，「渾金樸玉」受到遮蓋，「明星皓月」受到蒙蔽，於是乎觸發感悟，形之於詩。吉川幸次郎也解釋這段文字說：

古之詩人，必須是深刻的內在感情和外在特殊遭遇的強烈衝擊，才開始寫詩，其作品如奔騰咆哮的急流，如努力伸展軀體的長鯨，如希望被發現的泥沙中的純金和寶石，如從濃雲中拼命掙扎再現的明月和繁星。⁴²

古人爲詩，以詩人積聚於內心的情感，受到所處環境、時代背景和政治興衰的衝擊，產生屈曲盤繞，梗塞不順之情緒，無法遏抑，終於噴湧而出，就像「驚瀾奔湍」、「長鯨蒼虬」、「渾金樸玉」、「明星皓月」，勢不可敵，所作之詩必然巧奪天工，令人嘆爲觀止。錢謙益認爲詩歌「不當趣論其詩之妍媸巧拙」⁴³，而應以「志意偪塞，才力憤盈」時的「有詩」之作，才具有品評的價值，他在〈書瞿有仲詩卷〉中說：

所謂有詩者，惟其志意偪塞，才力憤盈，如風之怒于

⁴¹ 同註 7，《初學集》，〈虞山詩約序〉，頁 923。

⁴² （日本）吉川幸次郎、張連第譯：〈錢謙益的文學批評〉（《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頁 228。

⁴³ 同註 7，《有學集》，〈書瞿有仲詩卷〉，頁 1557。



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魄結轡，不能自喻，然後發作而為詩。凡天地之內，恢詭譎怪，身世之間，交互緯繡，千容萬狀，皆用以資為詩，夫然後謂之有詩，夫然後可以叶其宮商，辨其聲病，而指陳其高下得失。

44

詩人往往在志意受到侵迫，盈願的動力充滿內心，於是激發起創作的才華，就像是精神氣魄受到強大的壓抑，不得不發而為詩。所以能將天地間奇異而不近常理的現象，各式各樣、千態萬狀的人情，化為詩歌，所以作品充滿生命力、具有豐富的情感。這樣有內涵的作品，再進一步講求聲律格調，才具有欣賞的價值；否則「不疾而呻，不哀而悲」⁴⁵，為寫作而寫作，徒求形式格律，甚或剽竊前人字句、割裂文義，也只是聊備一格罷了！。

錢謙益在〈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中，說明古人寫作詩歌必有其動機，即創作的根源：

古之為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偏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⁴⁶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至《離騷》的憂幽怨憤，當「君臣、夫婦、朋友」人倫之情產生衝突，導致思緒鬱結、梗塞不順時，而尤以遭遇困頓、命運乖舛之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同前註。

⁴⁶ 同註7，《有學集》，〈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頁767。



際爲甚，於是創作出「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永垂不朽的傳世之作。

錢謙益主張「古之爲詩者有本」，當參差錯雜的情感糾葛產生之時，情動於中，命運的困頓、時不我與的感慨交迫，詩人秉持著耿介高潔的情懷，激蕩出至情至性的深刻作品。所以張健說：「錢謙益的詩學也扭轉了公安派的異端傾向而朝儒家詩學回歸」⁴⁷，錢謙益的「世運說」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寫作動機有明顯的差異。「感物而動」是詩歌創作的根源，錢謙益尤重詩人情感與時代環境的相互激蕩，表現詩歌的現實精神，於是主張「世運說」。

三、「溫柔敦厚」：詩歌創作的本質

《禮記》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⁴⁸，「溫柔敦厚」的詩教，在抒發性情的同時，也能兼顧禮義的節度，可以使人民的性情潛移默化。錢謙益重視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他在〈婁江十子詩序〉中說：

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自歌《頌》歌《雅》以逮于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于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溫柔敦厚，詩教也。⁴⁹

⁴⁷ 張健：〈從公安、竟陵到雲間、虞山—明清之際詩學的回歸正統與對立綜合〉（原學第一輯），頁 219。

⁴⁸ 《禮記正義》，〈經解〉，頁 845。

⁴⁹ 同註 7，〈有學集〉，〈婁江十子詩序〉，頁 845。



據《禮記》〈樂記〉所載，師乙（不詳）曾回答端木賜（約520—456 B.C.）「宜何歌」之提問：「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⁵⁰，所以說，《頌》、《雅》、《齊》各有其特色及功用，了解《詩經》六義的作法和體裁，考究本源，就能體會溫和而篤實寬厚，這是詩經的教化功能。

錢謙益說君子在「深情感蕩」之際寫作詩歌，仍堅持遵行「詩教」，他在〈陸敕先詩稿序〉中指出：

性不能不動而爲情，情不能不感而緣物，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情之發于聲音者也。古之君子，篤于詩教者，其深情感盪，必著見于君臣朋友之間。⁵¹

緣物而情感，情感而性動，因而形之於言，當詩人的感情受到境遇的衝擊，強烈之情無法遏制時，不得不發爲詩歌。寫作詩歌要「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⁵²，強調家國憂思對詩歌情感的激發作用。在〈施愚山詩集序〉中，錢謙益又說：「詩人之志在救世，歸本於溫柔敦厚」⁵³，挽救時世是詩人的使命，也是真情的流露。

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⁵⁴既要求「溫柔敦厚」，那麼如何表達憤慨之情？非不能「怨」，重要的是怨憤的原因和目的。錢謙益〈顧伊人詩序〉云：

⁵⁰ 《禮記正義》，〈樂記〉，頁701。

⁵¹ 同註7，《有學集》，〈陸敕先詩稿序〉，頁824。

⁵² 同註7，《有學集》，〈胡致果詩序〉，頁801。

⁵³ 同註7，《有學集》，〈施愚山詩集序〉，頁761。

⁵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述而〉，頁62。



子夏不云乎：『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情動於中而形於聲，亂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猶治世之不能不安以樂也。⁵⁵

《毛詩·序》說：「亂世之音怨以怒」⁵⁶，「怨」和「怒」的原因，在於對國家興亡的關切，因此發展出比興的作法，藉以達到怨刺的效果。《毛詩·序》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⁵⁷，用含蓄委婉的言辭，寄寓規諫之意。如此託辭不直言，使聞者自悟，就是「溫柔敦厚」性情的展現。所以唐代白居易說：「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⁵⁸，詩歌只有為時而著，為事而作，才能發揮社會功能。

錢謙益認為乖舛的命運、國家的興廢和歷史的巨變，都足以激發詩人內在蓄積的情感，境遇愈是困窘急迫，愈能激發詩人的情操，創作出優秀的作品，留傳後世。在表達對社會國家的關注時，錢謙益以「剛柔」來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文章，錢謙益說：「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⁵⁹，君子之文陽剛，正直敢言，力矯時弊；小人之文陰柔，看似誠懇溫順，卻以陰柔害物，誣詔忠良。所以錢謙益認為能為社會服務、

⁵⁵ 同註7，《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顧伊人詩序〉，頁442。

⁵⁶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關雎〉，頁17。

⁵⁷ 同前註，頁16。

⁵⁸ （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采詩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頁56。

⁵⁹ 同註7，《初學集》，〈趙文毅公文集序〉，頁899。



匡扶世運的詩歌，才是有價值的作品，錢謙益稱之為「儒者之詩」、「英人志士之詩」。

錢謙益〈顧麟士詩集序〉云：「炎漢以降，韋孟之諷諫，束廣微之補亡，皆所謂儒者之詩也」⁶⁰，西漢韋孟（約 228—156 B.C.）〈諷諫詩〉，以四言的詩歌形式反映現實，表現憂國憂民的情操；晉代束皙（約 261—300）《束廣微集》〈補亡詩〉，以擬古的方式，抒寫生活的感受，反映人民的生活。這些都是古代文人關懷國計民生的具體實踐，錢謙益稱之為「儒者之詩」，與為寫作而寫作的「詩人之詩」有別。

錢謙益〈趙友沂詩稿序〉指出：「英人志士之詩，渾渾熊熊，碌碌落落，如劍花之在室，如鏃聲之出弦，其聲影在有無之間，不可以候而得也」⁶¹，詩人在情生於境、怨怒交逼之時，詩歌自然產生，如〈西陵二張子詩序〉所言：「指事則低回慨慷，言愁則憔悴婉篤」⁶²，此時的詩作與「詞人才子之詩」有別，更不是駢枝儷葉、雕章刻句，以辭采為尚之作所能企及。所以「儒者之詩」、「英人志士之詩」是「溫柔敦厚」的展現，更是「世運說」的應證。

若以傳統詩教而言，流於謾罵的怨怒情感的表達，是亂世的象徵，這是儒家所忌諱的。對此，錢謙益在詩歌中的實踐並不徹底。在明思宗崇禎十年（1637），常熟陳履謙、張漢儒（不詳）為求富貴，誣詔錢謙益、瞿式耜（1590—1650）居鄉不法；溫體仁（1573—1639）接到疏狀，不論是非，立即下令逮捕錢、瞿二人，是為「丁丑獄案」。在拘繫錢、瞿赴京，途經山東時，錢謙益在費縣道上寫下「櫪中馬老空知

⁶⁰ 同註 7，《有學集》，〈顧麟士詩集序〉，頁 823。

⁶¹ 同註 7，《牧齋外集》，〈趙友沂詩稿序〉，頁 657、658。

⁶² 同註 7，《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西陵二張子詩序〉，頁 413。



道，爨下車勞枉作薪。當食爲君三歎息，難將更僕話窮塵」⁶³的詩句，比喻自己懷才不遇，良木只能成爲爨下薪火。雖命在旦夕，卻無暇顧及個人將赴黃泉，仍爲國家擔憂嘆息，充分展現志士仁人的愛國情操，也是「世運說」中「溫柔敦厚」詩旨的具體實踐。然而到了京城下刑部獄，身繫囹圄後，主張「溫柔敦厚」的錢謙益，以憤懣的心情，寫下「睡起惺騰扶白首，可知羅網是君恩」⁶⁴的詩句，強烈反諷崇禎皇帝的賢否不明。

在明思宗崇禎十二年（1639），錢謙益的友人受到朝廷提拔，錢謙益寫下「莫爲提攜感移奪，君恩容易比秋風」⁶⁵，提醒友人不要輕易被皇恩感動，以免隨時降臨的貶謫，造成反差和錯愕。崇禎十六年（1643），因周延儒外揚內排，未受到起用，〈謝輦下知己及二三及門〉詩云：「絕交莫笑嵇康懶，卽是先生誓墓文」⁶⁶，表示歸隱之意，謝絕薦舉，其實是借詩發抒對周延儒的怨憤。如此違反其詩學主張的表現，反映了錢謙益二十九歲中進士被授翰林院編修起，至八十三歲去世，五十四年間，爲官從政生涯不過六年的悲哀，但可明顯感受與其「溫柔敦厚」的理論主張相違背，造成詩歌實踐中的缺憾。

⁶³ 同註 7，《初學集》，〈費縣道中三首〉其三，頁 362。

⁶⁴ 同註 7，《初學集》，〈獄中雜詩三十首〉其十九，頁 399。

⁶⁵ 同註 7，《初學集》，〈曲江歌十絕句奉寄香山何相公〉，頁 528。

⁶⁶ 同註 7，《初學集》，〈謝輦下知己及二三及門〉四首其一，頁 722。



四、「窮而後工」：詩歌創作的的方法

詩歌是表現對現實的感受，詩人在境遇困窘窮迫時，情境相互激蕩，於是藉創作以抒發不平之鳴，因此詩人對待世間萬物的角度與世俗迥異，錢謙益〈馮定遠詩序〉云：

是故軟美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厚，世俗之所嘆羨也，而詩人以爲笑；凌厲荒忽，敖僻清狂，悲憂窮蹇，世俗之所詢姍也，而詩人以爲美。人之所趨，詩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以爲憂，人怒而詩人以爲喜。故曰：詩窮而後工。⁶⁷

所以說，世人所嚮往的榮華富貴，詩人棄之如敝屣；世人所厭惡的孤窮艱危，詩人視之爲凄美；世人讚美的，詩人爲之憂心；世人憤怒的，詩人爲之欣喜。所以說，窮厄困頓、憂愁憤懣之士寫作詩歌，更能含吐生命的樂章。

錢謙益又云：「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困偪塞，偃蹇排翫，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⁶⁸，古代詩人寫作詩歌，必有獨特的稟性、情感和學問，等到情感糾纏逼迫、困頓已極，不吐之不快，於是詩歌應時而生，而且能感動人心。孫之梅在說明錢謙益「深情畜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⁶⁹時說：「鬱勃不平之氣，壓抑憤激之思，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世風澆漓，人心不古，政暗主昏，是非顛倒，所有這些感喟悲

⁶⁷ 同註7，《初學集》，〈馮定遠詩序〉，頁939。

⁶⁸ 同註7，《初學集》，〈馮定遠詩序〉，頁939。

⁶⁹ 同註7，《初學集》，〈虞山詩約序〉，頁923。



鳴都是人被社會壓抑扭曲的無奈樂章」⁷⁰，這就是詩人「獨至之性，旁出之情」的高度展現。

唐代韓愈（768—824）提出「不平則鳴」之說、宋代歐陽修（1007—1072）則有「窮而後工」的論點，將文學創作與現實境遇緊緊聯繫起來，認為詩人乖舛的身世時命，正是詩歌的創作的來源。韓愈〈送孟東野序〉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⁷¹，歐陽修在〈梅聖愈詩集序〉中說：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⁷²

歐陽修認為古代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所以詩歌多出於困厄之士。凡富有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於世者，多寄情於山水之間，見自然景物，往往探究其奇特怪異之處，內心鬱積憂愁、憤慨，將之化為詩興，寄託於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悲歎，寫出難於言喻的感受。所以說，愈是困厄就愈能寫出感蕩心靈之作。所以說，並非寫詩使人困厄，而是困厄後才更能寫出好詩。

⁷⁰ 孫之梅：《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頁268。

⁷¹ （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送孟東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頁201。

⁷²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梅聖愈詩集序〉，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3月），頁612。



錢謙益贊同「窮而後工」的說法，並以此讚揚馮班（1602—1671）的詩：「其為詩，沈酣六代，出入于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苦，樂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⁷³，錢謙益說馮班（字定遠）的詩有李商隱（813—858）、杜牧（803—852）、溫庭筠（？—866）晚唐詩風的特點，關懷家國，憂時傷亂，是「窮而能工」境界的具體呈現。

錢謙益評論李宜之（1575—1629）的詩：「其才華志意，漸歸平實，抒情徵事，仗緣託物，遠師香山，近倣石田，于世之蠅聲蚓竅，聲轉喉而吟擁鼻者，邈乎不相及也」⁷⁴，李宜之（字緇仲）是錢謙益至友李流芳（1575—1629）的姪子，錢謙益說李宜之的詩在易代前後，因外在境遇的改變，詩歌的內涵意蘊轉趨平實，遠承白居易（772—846），近效沈周（1427—1509），詩境高遠，遠遠超越天啓、崇禎（1621—1644）年間竟陵派的「蠅聲蚓竅」、「喉聲鼻吟」，這也是「窮而能工」的結果。

在稱誦李宜之詩歌的改變之後，錢謙益接著說：「歐陽子有言，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也，豈不信哉！」⁷⁵此言「詩能窮人」與歐陽修原文「非詩之能窮人」之意有異，重點在於「窮而後工」，強調境遇的重要。再加上「其境會遘適，支離復逆，皆用以資其為詩」⁷⁶，境遇殊異，漂泊流離，感觸良多，非當世膚淺之士所能企及。錢謙益再一次申言「窮而後工」的詩學主張。

⁷³ 同註7，《初學集》，〈馮定遠詩序〉，頁939。

⁷⁴ 同註7，《有學集》，〈李緇仲詩序〉，頁838。

⁷⁵ 同前註。

⁷⁶ 同前註。



「窮而後工」也是錢謙益入清後，艱難處境的寫照，對自己喪失民族氣節，深沉的恨悔和自責，正是他詩歌理論中「身世逼塞，志意鬱結」的真實呈現。胡明說：「錢謙益論詩著意身世逼塞，志意鬱結的抒寫，而尤強調詩人主觀情志奔逸時受到的巨大外物的阻遏」⁷⁷，所以錢謙益面臨明清陵谷滄桑之變，一身兩姓之慚，表現在詩歌中的沉鬱頓挫、雄渾悲壯，正是「窮而後工」創作方法的應證。

五、「詩兼史義」：詩歌創作的功能

錢謙益認為詩歌具有記史的功能，他在〈贈王平格序〉中，引用王天佐（不詳）的〈贈孫子序〉說：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之大指，明王道、扶世運。《春秋》未作，則《詩》其《春秋》乎？莊公十年，荊敗楚師，始見經。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始內通。書召陵之師大服楚，此〈采芑〉之卒章也。⁷⁸

齊桓公（？—643B.C.）時，楚國北犯，被阻於召陵，《春秋左傳正義》，鄭莊公十年載：「荊敗蔡師於莘」⁷⁹，鄭莊公二十三年載：「荊人來聘」⁸⁰，而《詩經·小雅·采芑》之卒章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⁸¹，言荊楚竟敢與大國爲敵，

⁷⁷ 胡明：〈錢謙益入清後詩歌試論〉，頁188。

⁷⁸ 同註7，〈有學集〉，〈贈王平格序〉，頁913。

⁷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卷八，頁146。

⁸⁰ 同前註，卷十九，頁321。

⁸¹ 《毛詩正義》，卷十，〈采芑〉，頁362。



《毛詩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⁸²。在《春秋》之前，《詩經》以詩歌的形式，反映國際的政治形勢，具有「詩史」的意義。

「詩史」之名，最早出現在晚唐孟棨（不詳）《本事詩》⁸³：「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杜甫遭逢安史之亂，顛沛流離，既能陳述史實、反應時事，更可補史之闕，正史之誤。因此自孟棨此說出，後人紛以「詩史」稱譽杜甫反映時事之詩。

錢謙益高度讚揚杜甫詩歌「詩史」的表現，繼承儒家「以文明道」的精神，他說：「詩道大矣，非端人正士不能為，非有關於忠孝節義綱常名教之大者，亦不必為」⁸⁴，所以錢謙益認為詩歌的內容，若非關乎三綱五常、名分與教化此類重要的議題，沒有寫作的必要。所以詩歌除了發抒個人的情感之外，更具有「以詩證史」的積極意義。

錢謙益讚賞劉基（1311—1375）的詩：「余考公事略，合觀《覆瓿》、《犁眉》二集，竊窺其所為歌詩，悲惋衰颯，先後異致。其深衷託寄，有非國史家狀所能表其微者」⁸⁵，劉基《覆瓿集》作於元末，主要反映政治的腐敗和人民悲苦的生活；《犁眉公集》作於明初，所謂的「深衷託寄」，就是指劉基在朱元璋妄稱君臣遇合下的曲折反映，明末張岱

⁸² 同前註，頁 360。

⁸³ （唐）孟棨撰：《本事詩》，〈高逸〉（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陽山顧氏文房本影印，1966年）。

⁸⁴ 同註 7，《有學集》，〈十峰詩序〉，頁 831。

⁸⁵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天啟崇禎遺事詩》，「劉誠意基」，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2月），頁 70。



(1597—1679)說：「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個誣妄世界」⁸⁶，張岱入過史館，此言或謂之太過，然而國史、家史對於劉基與朱元璋的互動，反倒不如劉基詩歌的真情流露、刻畫入微。所以劉基的詩具有「以詩證史」的積極意義。

錢謙益將個人的境遇和天地世運相連，冀求詩人用詩歌記錄歷史，用詩歌反映時代。錢謙益〈熊雪堂恥廬近集序〉云：「何言乎救時也？劫運初迴，氛機未息。刀兵戛擊於閭閻，征調突隳乎郛屋。憂天禍、憫人窮，嗟咨愴嘆，情見乎詞」⁸⁷，時局動盪，戎馬生郊，戰禍蔓延，災厄不斷，民間征調離亂，民怨四起，於是悲天憫人、悲嘆命運之作應時而生，作者將情感化爲文字，積極表現於文辭之中。

詩人的思想情感因個人遭遇而波動，更與社會現實的脈動息息相關，尤以面臨歷史的興亡巨變之時。清代趙翼(1727—1814)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⁸⁸，趙翼評元好問(1190—1257)曰：「值金源亡國，以社稷丘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⁸⁹，主張文學作品必須具有史的內容，史的價值。

錢謙益認爲「詩」爲廣義的「史」，他說：

⁸⁶ 胡益民著：《張岱評傳》，收入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頁84。

⁸⁷ 同註7，《牧齋外集》，〈熊雪堂恥廬近集序〉，頁682。

⁸⁸ 語見〈題元遺山集〉詩，收入（清）趙翼撰、胡憶尚選注：《趙翼詩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62。

⁸⁹ （清）趙翼：《甌北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頁1267。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⁹⁰

孔子（551—479B.C.）作《春秋》、刪定《詩經》，錢謙益認為孔子將《詩經》視同《春秋》以前的史書。《論語》：「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⁹¹南宋朱熹（1130—1202）於各句下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⁹²，《詩經》透過比興的方式，表達受到激發的情志，反映風俗民情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通過《詩經》的教化作用，可以促進人際間情感的良性互動，秉持溫柔敦厚的詩教，諷刺上位者執政的過失，抒發民怨。所以說，《詩經》具有積極的社會功能，肩負與「史」相同的鑑往知來的歷史責任，因此錢謙益認為《詩經》、《尚書》、《春秋》為一脈相傳之書。錢謙益又指出：

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

⁹³

⁹⁰ 同註7，《有學集》，〈胡致果詩序〉，頁800。

⁹¹ 《論語注疏》，〈陽貨〉，頁156。

⁹²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陽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月），頁178。

⁹³ 同註7，《有學集》，〈胡致果詩序〉，頁801。



三代以後，「詩」與「史」漸行漸遠，然而詩歌反映時代變遷之特徵是不容置疑的，錢謙益以三國魏曹植（192—232）的〈贈白馬王彪〉、魏晉之際阮籍（210—263）的〈詠懷詩〉、西晉劉琨（270—317）的〈扶風歌〉、西晉張載（約289年前後在世）的〈七哀詩〉爲例，說明這些詩歌的歷史價值。

曹植作〈贈白馬王彪〉，曹魏文帝黃初四年（223），曹植和白馬王、任城王俱朝京師，任城王死在京城。曹植和白馬王因遭到已稱帝的曹丕猜忌，被禁止在歸蕃的路上一同住宿，曹植憤而寫成〈贈白馬王彪〉七首。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是其詩歌的代表作。當時魏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阮籍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不滿，但迫於無奈，明哲保身，因作詩以表志遺懷。

劉琨的〈扶風歌〉作於晉惠帝永嘉元年（307），劉琨出任並州（今山西太原）刺史，由京都洛陽赴任途中。西晉王朝經過「八王之亂」，國勢漸衰，內憂外患，劉琨立志匡扶晉室，但又擔憂是否能獲得朝廷的信任，故有此作。張載的〈七哀詩〉，現存二首，時當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內容描寫邊地荒寒，人民深受戰爭之苦。

雖然三代以降，詩與史分途，但是這些作品對於時局世運、朝廷盛衰、權力升降，作了真實的呈現，具有「詩史」的特徵。到了唐代杜甫，有更具體集中的表現，被稱爲「詩中之史」。

所以「詩」可以說是廣義的「史」，錢謙益「以詩證史」的主張，由此得到更有力的支持。錢謙益身不逢時，懷念前明的詩篇，寄寓了強烈的復明心志，和杜甫的詩史精神類似。



錢謙益論述了世運的變化對文學的深刻影響，當詩人遭逢亂世的興衰巨變，滄桑陵谷，黍離板蕩之際，「詩」正是「史」最真實的反映和紀錄。錢謙益繼承了唐代白居易（772—846）：「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⁹⁴的現實主義傳統。

錢謙益認為留傳千古的佳作，往往產生於「陽九百六、淪亡顛覆」⁹⁵之時，「宇宙偏沲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⁹⁶之際。個人的時運困厄，固然引發詩人的感嘆，而國家的淪亡傾覆，更是沈重的打擊，於是忠臣志士將遭遇厄運的憤盈之氣，發抒於詩歌之中。明清之際，民族危難遠甚於杜甫遭逢的「安史之亂」，以詩傳史，詩備史義，詩歌真實全面地反映滄海桑田之變，身世命運之乖，這就是錢謙益世運思想的具體呈現。

胡明說：「錢謙益論詩不侷促於詩之格律聲病，意匠機巧之能事，而往往站在詩外凝神窺測詩人與天地物色交互紛錯之消息，就是說他更多地注意詩人自身的情性氣志與客觀世運境會的有機聯繫」⁹⁷，「世運境會」對身處明清易代，憂世懷國，卻又曾率先迎降、有辱名節的錢謙益而言，更能體會以詩表志、以詩記史的重要，因此在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兩方面，皆大力提倡世運說。

⁹⁴（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與元九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頁649。

⁹⁵同註7，《初學集》，〈純師集序〉，頁1085。

⁹⁶同前註。

⁹⁷胡明：〈錢謙益入清後詩歌試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2月），頁188。



錢謙益在〈題交蘆言怨集〉中說：「吾之所取于《吾炙》者，皆其緣情導意、抑塞磊落、動乎天機而任其自爾者也」⁹⁸，《吾炙集》是錢謙益清初詩歌的選集，他在這裡說明了《吾炙集》的著作旨趣，以及選詩的宗旨，大多是感慨世運的遺民詩，這也是他詩史思想的具體呈現。

另外，關於《投筆集》的評價，清代陳寅恪（1890—1969）說：

《投筆集》諸詩摹擬少陵，入其堂奧，自不待言。且此集牧齋諸詩中頗多軍國之關鍵，為其身所預者，兆少陵之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故就此點而論，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⁹⁹

明末瞿式耜（1590—1650）壯烈殉國，吳偉業（1609—1672）說：「錢宗伯為詩哭之，得百二十韻（應為百十韻），其敘〈浩氣吟〉，文詞伉烈，絕可傳」¹⁰⁰；清代凌鳳翔（不詳）為錢謙益《初學集》作序時說：「皆有關時事之大，可備一朝典故，足稱詩史」¹⁰¹；凌鳳翔在《有學集》序中又說：「隆伯之詩可以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其關係重大有若此也

⁹⁸ 同註7，《有學集》，〈題交蘆言怨集〉，頁829。

⁹⁹ （清）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年1月），頁1193。

¹⁰⁰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頁1147。

¹⁰¹ 同註7，《初學集》，附錄〈凌序〉，頁2230。



哉？」¹⁰²由此可知，錢謙益的詩歌，真實地反映明清之際的社會現況，表現時代悲劇，體現「詩史」的精神。

《初學集》中有許多反映時局的詩作，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當時錢謙益三十七歲，滿清正如如火如荼地攻打東北。〈夜泊澹墅觀卻寄董太僕崇相〉詩云：「鑽刀可忘降夷狡，賜劍還防宿將驕」¹⁰³，由此詩句可探悉當時東北的緊張局勢，以及明將的驕縱無能。〈疊前韻答何三季穆〉四首，也是描寫東北戰事緊張，其一：「但說艱危三太息，每逢朋舊一悲歌」¹⁰⁴，表現出對國事的憂心忡忡，其二：「衝車格格馬蕭蕭，天下徵兵盡度遼」¹⁰⁵，更直指戰事激烈、朝廷徵兵不已。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不理朝政，內訌不斷，國事飄搖，錢謙益諂事閹黨馬士英、阮大鍼，任禮部尚書。不到一年，清兵越過長江，錢謙益竟率先投降。清順治三年（1646）正月，被清廷授以秘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史副總裁，同年六月以疾告歸。錢謙益對以往所為，悔恨不已，為復明大業奔走，雖仍難擺脫「貳臣」的形象，但在明清易代後，《有學集》、《投筆集》中處處可見民族淪亡、血淚交迸的詩篇。

錢謙益巨型組詩〈後秋興〉六十四首，表露他以詩明志的心跡，他在詩中巧妙的運用隱語影射反清復明運動，〈後觀棋絕句六首〉其二：「眼底三人皆國手，莫將鼎足笑英雄」

¹⁰²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頁1254。

¹⁰³ 同註7，《初學集》，〈夜泊澹墅觀卻寄董太僕崇相〉四首其二，頁39。

¹⁰⁴ 同註7，《初學集》，〈疊前韻答何三季穆〉，頁41。

¹⁰⁵ 同前註，頁42。



¹⁰⁶，三人分指清廷、永曆政權及鄭成功海上部隊；甚至在注中交代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後秋興之三〉其三：「破除服珥裝羅漢」¹⁰⁷，錢謙益自注：「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藁以資之，始成一軍」¹⁰⁸，此注道出錢謙益與柳如是（1618－1664）籌資捐餉，幫助姚志卓建立五百人武裝部隊的事跡。無怪乎近百年後的清高宗乾隆（1711－1799）對他恨之入骨，全面禁燬¹⁰⁹他的著作。

所以錢謙益採取了借詩明志、以詩存史的方法，以詩歌傳達自任為遺民、志士的悲苦，他認為詩是一種廣義的史。雷宜遜說：「後人可以從錢氏的詩裡追尋歷史上世運隆污、政事清濁、人物是非、風俗厚薄的原委真跡。因此，他的詩，也被稱為明清之『詩史』」¹¹⁰；胡明也說：「錢謙益的詩歌尤其是他入清後的詩歌與他的詩歌見解、詩論主張是吻合的，兩者基本上可以互為印證」¹¹¹，這些當代學者都肯定錢謙益「以詩證史」的主張和成就。

六、結語

錢謙益認為「境會相感，情偽相逼」是創作的源泉。情生於境，情境又與際會相互激蕩，抒發鬱結的憂思，展現對社會的觀懷，自然能寫出感人的作品，突顯「境遇」對於詩

¹⁰⁶ 同註7，《有學集》，〈後觀棋絕句六首〉，頁33。

¹⁰⁷ 同註7，《投筆集》，〈後秋興之三〉，頁11。

¹⁰⁸ 同前註。

¹⁰⁹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修：《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華聯出版社，1964年1月），卷836，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

¹¹⁰ 雷宜遜：〈錢謙益的著作、人品和詩學〉，頁13。

¹¹¹ 胡明：〈錢謙益入清後詩歌試論〉，頁187。



人情感的激發作用，這就是錢謙益獨特的詩學主張——「世運說」，這個觀點突破了以往詩歌鑑賞的賓主地位。

錢謙益重視「世運」對詩歌的觸發，當詩人「深情蓄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時命困惱，壓抑的情感受到「奇遇」激發，創作的契機奔逸而出，作品往往具有「動魂悅魄」的感人力量。所以詩人「志足而情生，情萌而氣動」，情感受到激蕩，真情流露，於是將現實遭遇的複雜感受，表現於詩歌之中。

錢謙益注重詩歌與世運的關係，從詩史同源立論，說明詩歌的創作與史同義，明清易代，民族的危難、末世的悲涼，遠甚於杜甫時安史之亂的禍國殃民，錢謙益鼓吹詩兼史義、以詩證史，真實地反映身世遭遇之乖，滄海桑田之變，藉由詩歌深刻地體現時代的興亡巨變，將詩文創作與個人際遇、國家世運緊密結合。

錢謙益重視格調，更重視詩歌的內涵，「靈心、世運、學問」無一不是強調詩歌的內涵，這是錢謙益爲了矯正七子派、竟陵派過於講究形式風格所產生的弊端，進而提出的詩歌主張，也是錢謙益晚年對自己詩學理論的總結。楊連民說錢謙益：「論詩側重詩歌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內容，做到知人論世，避免架空蹈虛，力圖扭轉在他以前的詩學評論家論詩多從格調、文法、語言、藝術形式多方面立論，而忽視詩歌表達內容的形式化傾向」¹¹²，這是對「世運」的重視，使得詩歌內容的申寫，得到具體的方向；雷宜遜說：「錢謙益論詩，不侷促於詩之格律聲病、意匠機巧之能事，而是站在詩

¹¹² 楊連民：《錢謙益詩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7月），頁320。



外，更多地注意詩人自身的情性氣志與客觀外物的境遇機會的有機聯繫」¹¹³，此言切中肯綮，更是對錢謙益內容重於形式的有力說明。

錢謙益的「靈心、世運、學問」是其詩學理論的核心，與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有部分相似之處，但是詩歌的發展有其時代背景，墨守前人古法，忽略詩歌自然的發展規律，必然導致情志的失真。丁功誼說：「古學、性情、世運成爲錢謙益中年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崇禎、天啓年間大多數文人論詩的基本範疇」¹¹⁴，然而錢謙益得享高壽，經過長時間的淬鍊與整理，面對明末七子末流極端的剽擬古人與公安派、竟陵派主張性靈所帶來的文壇亂象，推動著錢謙益對文學與世運的關係，獲得更卓越的認識，使得他對七子派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竟陵派的「幽情單緒」、「幽深孤峭」，得到有力的反擊點，作出深刻的批判。由此可知，錢謙益「世運說」的獨特性與重要性，以及此說對明代及後代詩學的貢獻。

¹¹³ 雷宜遜：〈錢謙益的著作、人品和詩學〉，頁 12。

¹¹⁴ 同前註，頁 122。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一) 古籍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

《論語注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年十三經注疏本阮元刻本

《元刊本文心雕龍》（南朝梁）劉勰撰 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10月

《本事詩》（唐）孟棻撰 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陽山顧氏文房本影印 1966年

《白居易全集》（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5月

《韓愈全集》（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10月

《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10月



《歐陽修全集》（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 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書局 2001年3月

《袁宏道集箋校》（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7月

《詩歸》（明）鍾惺、譚元春選評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

《錢牧齋全集》（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8月

《列朝詩集小傳·天啓崇禎遺事詩》（清）錢謙益 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臺北：世界書局 1985年2月

《清史稿》（清）趙爾巽主編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1年5月

《晚晴簃詩匯》（清）徐世昌編選 北京：中華書店 1990年10月

《載酒園詩話》（清）賀裳 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6月

《甌北詩話》（清）趙翼 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6月

《日知錄集釋》（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12月

《薑齋詩話》（清）王夫之 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 明倫出版社 1971年12月

《黃宗羲全集》（清）黃宗羲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11月

《趙翼詩選》（清）趙翼撰、胡憶尙選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柳如是別傳》（清）陳寅恪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 2001年1月

《吳梅村全集》（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2月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清）覺羅勒德洪等奉修 華聯出版社 1964年1月

（二）今著

《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孫之梅 濟南：齊魯書社 1996年2月

《錢謙益詩歌研究》裴世俊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1年12月

《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丁功誼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4月

《錢謙益詩學研究》楊連民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年7月

《清詩紀事》錢仲聯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7年2月

《張岱評傳》胡益民 收入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年5月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著 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7年7月

《佛光大辭典》慈怡主編 高雄：佛光出版社 1989年2月



二、單篇論文

〈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的詩學綱領〉 孫之梅 《山東大學學報》 1996年第2期

〈靈心·世運·學問——錢謙益詩論小議〉 翁容 《漳州師範學院學報》 2002年第4期

〈靈心、世運、學問——論錢謙益的詩學體系〉 張永剛 《大連大學學報》 2008年10月

〈從公安、竟陵到雲間、虞山——明清之際詩學的回歸正統與對立綜合〉 張健 《原學》第一輯

〈錢謙益的著作、人品和詩學〉 雷宜遜 《中國韻文學刊》 1998年第2期

〈錢謙益入清後詩歌試論〉 胡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12月

〈錢謙益的文學批評〉 (日本)吉川幸次郎、張連第譯 《社會科學戰線》 1982年

